严复：中国目的论翻译思想的先驱
——再释“信达雅”

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讲席教授
谢天振

引言

自一百多年前严复提出了“信达雅”三字以来，围绕着“信达雅”三字的阐释就没有停息过。然而，这些阐释中的大部分，如果不是绝大部分的话，都对严复“信达雅”本意有误读和误释。值得注意的是，误读者在他们误释的基础上还营造出了一个既不符合严复本意、更偏离翻译本质的翻译理念，反过来还以这样的理念去指责严复，称“严复提出了‘信达雅’，但他自己的翻译却没有做到‘信达雅’，尤其是没有做到‘信’”，等等。

而更有必要指出的是，这样的翻译理念在当代中国翻译界还占据着主流地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误导着我国翻译界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尽管我们也看到，在以“译入”行为为主的时期，这样的翻译理念也不无它的正面意义，因为交出一份所谓的“信达雅”的译文，对外来文化的传播还是有它的积极贡献的。然而，在当今的文化外译阶段，这种追求表面的“信”而无视“达”的翻译思想就暴露出了它的弊病。

一、误读始于把“信达雅”简单地奉作一切翻译的标准

贺麟（1925年）：“严复在翻译史上第二个大影响，就是翻译标准的厘定。他于《天演论》例言里发表他的信雅达三条标准，.....虽少有人办到，但影响却很大。”（贺麟：《严复的翻译》，转自罗新璋《翻译论集》P217）

梁启超（1922）：“译事之难久矣。近人严复，标信达雅三义，可谓知言，然兼之实难。语其体要，则惟先信然后求达，先达然后求雅。”（梁《佛典之翻译》）

此处梁对“信达雅”的阐释已经背离严复的本意，纯粹按三字的位置确定其意义和地位。后世对“信达雅”三字的类似误释也就不足为奇。

陈康（1942）：“关于翻译，严几道提出‘信’‘达’‘雅’三个条件来。‘信’可说是翻译的天经地义：‘不信’的翻译不是翻译；不以‘信’为理想的人可以不必翻译。‘达’只是相对的。”（陈康《论信达雅与哲学著作翻译》，罗P524）

不难发现，陈康的话，已经把“信达雅”推向了“信”这个极端。

吴献书（1949）： 严复“‘信达雅’三字就成了这几十年来的翻译原则；批评翻译的人亦大都把这三字作标准。实则在我们意中的‘信达雅’与严氏的‘信达雅’几已完全不同了……我们现在对这三字的解释是（1）‘信’：对于原文忠实……（2）‘达’：译文明白晓畅……（3）‘雅’：译文文字优雅。”（《英文汉译的理论与实际》开明，1949年第四版）

这恐怕也是迄今为止大多数人对“信达雅”的理解和阐释。

譬如，卞之琳、叶水夫、袁可嘉、陈燊（1959）：“‘信、达、雅’标准早已成了我国的传统翻译标准，我们今天也没有否定它的必要。用通俗的话来说，‘信’是对原著内容忠实，‘达’是译文畅达，‘雅’是译文优美。”（《艺术性翻译问题与诗歌翻译问题》，P654）

一百多年来对“信达雅”误读、误释偏离了严复本意，同时还营造出了一套违背翻译本质的翻译理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误导着我国翻译界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

（看不到翻译的跨文化交际的本质，理解不了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片面追求表面的忠实，忽视接受、传播、影响等实际效果）

二、严复“信达雅”本意探索

严复：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

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审择于斯二者之间，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岂钓奇哉！不佞此译，颇贻艰深文陋之讥，**实则刻意求显，不过如是。**（罗修P202-3）

从以上三段话可以看出，严复标出“信达雅”三字，一是抒发对翻译之难的感慨，二是宣示其为自己设定的翻译原则——求“达”。而且，纵观严复的翻译实践，他始终严格地遵循着他为自己设定的翻译原则。

试看他的《名学浅说》一书的“译者自序”：

“中间义旨，则承用原书；而所引喻设譬，则多用己意更易。**盖吾之为书，取足喻人而已，谨合原文与否，所不论也。**”（《名学浅说》译者自序，罗P212）

但也不是没有人看出严复标举“信达雅”的真正用意，如王佐良：

拿实践来检验他的理论，我们就容易看出：他之所谓“信”是指为这样的读者（按：指当时对西洋文化无兴趣、甚至有反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准确传达原作的内容，“达”是指尽量运用他们所习见的表达方式，“雅”是指通过艺术地再现和加强原作的风格特色来吸引他们。吸引心目中预定的读者，这是任何译者所不能忽视的大事。（王《严复的用心》1981）

沈苏儒：

从翻译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严复作为一位翻译家能在一百年前就把译本所预期的读者纳入视野，并把达成交流的目的作为翻译的首要任务，不能不说是具有极大理论价值的创见。（沈苏儒《论信达雅》1998，P57）

“严复的‘达’，始终是以意义为本的。”

“具体地看看严复作出这选择的背后原因和动机，这对于全面理解严复的翻译理论有很大的帮助。” （王宏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第82、88页。）

“既然这样，他（指严复）的译作是否成功，便不在于它们可不可以做到我们今天所说的‘忠实’、‘通顺’或其他别的什么翻译标准，而在于能不能够在维新自强的运动中发挥作用，也就是把一些对中国当时的改革有帮助的讯息带给那些足以左右维新运动的读者，从而推动维新改革，达到富国强家的目的。由此可见，严复所关注的并不是翻译本身，也不是原著，而是经由翻译输入的思想怎样可以对中国读者产生作用。”（同上第93-94页）

“严译中换例的例子很多，不必在这里一一胪列。但由此可以看出，严复其实并不是真的要逐字逐句去进行翻译，这根本不是他所追求的目标。这段引文中所说的‘谨合原文与否，所不论也’便是这个意思，而‘取足喻人’才是他的标准。‘信、达、雅’始终以内容为主，而‘取足喻人’也就是要把内容和意义好好地告诉读者，让读者清楚明白。可以说这就是严复翻译理论的中心所在。”（同上，第105页）

三、“再释信达雅”
启迪对传统翻译思想的反思

中国传统翻译理念：

案本—求信—神似—化境

罗新璋：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四个概念，既是各自独立，又是相互联系，渐次发展，构成一个整体的，当为我国翻译理念体系里的重要组成部分。

案本—求信—善译

信达雅—神似—化境

马建忠《拟设翻译书院议》：

夫译之为事难矣，译之将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先将所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屈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覆，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之成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是则为**善译**也已。

“神似、化境”与“案本、求信”并非一脉相承，后者的基础是佛经翻译，前者-文学翻译

后者标榜“原文至上”，追求“忠实为要”

前者讲究效果

站在当代立场上看，我们也许可以发现，与严复翻译思想遥相呼应的是傅雷的“神似”说　和钱钟书的“化境”说。

共性：审美效果和接受效果

翻译的跨文化交际本质

其实，严复的“信达雅”本来已经揭开了中国传统译学思想的新层面，但被后来的阐释者断章取义，简单化为翻译的标准，且望文生义地以为“信”是第一位的，违背了严复的本意。

严复：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天演论》译例言，罗P202）

四、“再释信达雅”的现实意义

1. 正本清源，重新梳理和认识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发展脉络，从中汲取有益的思想资源，推进当代中国的译学理论建设；

2. 在文化外译正在越来越成为当代翻译研究的关注热点之时，正确认识严复的翻译思想与实践为我们思考文化外译理论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